

编者絮语：

穿透绝望的希望

纪念《被钉十字架的上帝》问世五十周年
(1972—2022)

洪 亮

如何在兼具深度与现实感的基础之上理解绝望和希望的关系，这个基本问题贯穿了“短暂的二十世纪”，也必将伴随已迈入后疫情时代的二十一世纪。在出生并成长于二十世纪的世界级基督教思想大家中，莫尔特曼（Jürgen Moltmann, 1926-）对这个问题的响应独树一帜，代表了欧洲大陆战后一代对和平与多边主义价值的精神探索，它内在的创造力和人道主义价值使其影响力至今不绝。

二十世纪的现代基督教思想史编纂倾向于认为，莫尔特曼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为他始于1964年的“希望三部曲”和“弥赛亚六部曲”。2016年，莫尔特曼迎来九十华诞，德语学界在不来梅市政厅为其举办九十寿辰庆祝会，值此庆祝会之际，德国贵特斯劳出版社正式推出涵盖这两个系列的九卷本《莫尔特曼著作集》^①，标志着莫尔特曼这位当世学术大家在现代基督教思想史中经典化的完成。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随着莫尔特曼在欧洲、美国、拉美、非洲、东亚日益获得认可，汉语学界开始关注其著述。自1985年以来，莫尔特曼本人也数度访问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重要科研机构，发表学术演讲。2010年秋，莫尔

^① Jürgen Moltmann, *Jürgen Moltmann Werke, 9 Bände*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2016).

特曼参加“北京论坛”，发表主旨演讲“论时代危机中的一种生命文化”^①，阐述宗教恐怖主义敌视生命的虚无主义内核，引发热烈反响。论坛期间，莫尔特曼受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邀请，与当代著名新儒家杜维明就天、地、人三个概念展开对谈^②。2014年秋，莫尔特曼受中国人民大学邀请，参加以“与莫尔特曼对话”为主题的高峰论坛，与数位资深人文学者就其著述中的核心论题^③展开对谈。这些持续而深入的学术交流促进了汉语莫尔特曼研究的发展。2010年之后，汉语学界针对莫尔特曼的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期，除研究论文不断涌现之外，目前已有八部论著^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莫尔特曼对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道家自然观保有浓厚兴趣，《道德经》中的创生观对他上世纪70年代的生态思考^⑤有不小的影响

莫尔特曼一生治学道路的核心方向是终末论，1964年出版的《希望神学：基督教终末论的奠基及其后果研究》^⑥既构成了这条道路的开端，也奠定了莫尔特曼的国际声望。在这部当时取得巨大成功^⑦的论著中，莫尔

^① 参北京论坛官网报道：<https://news.pku.edu.cn/bjlt2022/ljlt/dbed991990324d3e9dd1a3fcd80dbb45.htm>。

^② 参2010年北京大学新闻网报道：<https://news.pku.edu.cn/zrd/bjlt2010/1976-187188.htm>。

^③ 这次对谈的实录发表于《基督教文化学刊》，2015年第34辑，第26-59页和第60-87页。

^④ 这八部论著分别为：林鸿信：《莫特曼神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杨华明：《十字架上的盼望：莫尔特曼神学的辩证解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曹静：《迎向更新的宇宙：莫尔特曼的终末论生态观》，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张旭：《上帝死了，神学何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邓绍光：《盼望神学：莫特曼》，香港：基道出版社，2014年；郭郁：《莫尔特曼的「希望」范畴》，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区应毓，《莫尔特曼希望神学省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洪亮，《巴特与莫特曼管窥》（香港：德慧文化，2021）。

^⑤ 【德】莫尔特曼：《莫特曼论中国文化》，邓肇明、曾念粤译，香港：基道出版社，2008。

^⑥ Jürgen Moltmann, *Theologie der Hoffnung. Untersuchungen zur Begründung und zu den Konsequenzen einer christlichen Eschatologie*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2016).

^⑦ 这部著作在正式出版后四年之内出了六版，被译为五国语言。参见莫尔特曼在自传中的回忆：Jürgen Moltmann, *Weiter Raum. Eine Lebensgeschichte*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2006), 104-105。

特曼基于旧约的出埃及传统与欧洲近代早期的盟约神学传统，以不断开启历史实践视阈的神性应许（*promissio*）以及基督复活对此应许的确证来诠释启示概念，为希望提供了一个与启蒙乐观主义截然不同的定义：希望并非意欲的投射，而是对绝望的超越，其依据是上帝在历史场域中的终末性行动。按照莫尔特曼本人的解读，八年之后出版的《被钉十字架的上帝：基督的十字架作为基督教神学的基础与批判》强化了希望定义中的现实主义倾向，如果说《希望神学》强调了对绝望的超越，《被钉十字架的上帝》则是聚焦于绝望本身，前者的论述模式是复活节中心论，在后者则是受难日中心论，两部著作彼此互补。如果我们不被他这个读者友好型的简化式解读所束缚，尊重两者各自的独立性，则会发现《被钉十字架的上帝》在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上实现了对《希望神学》的超越：一个以应许不断开启历史境域的“强”上帝形象被一个经历绝望黑暗的“弱”上帝形象所取代，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基督教思想迎来一种从未得到过深入阐述的独特的上帝论。公允而言，应许概念诚然扩展出上帝论的将来向度，但难以使其在根本上区别于二十世纪的其他上帝论方案，然而《被钉十字架的上帝》中的“弱”上帝方案却独一无二，不同于前人，它融汇了作者的生命体验、历史记忆、学识素养和神学想象力，是莫尔特曼在四十六岁之时企及的又一个思想巅峰。上帝论从来是衡量神学品质的标尺，就此而论，《被钉十字架的上帝》比本来已极有份量的《希望神学》更具份量，代表了半个世纪之前世界基督教思想最重要的收获。

1994年，尚处“试办期”的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香港）筭路蓝缕，推出《被钉十字架的上帝》的繁体中文译本^①，译者为彼时在深圳大学文学院任教的阮炜教授^②，这个中译本也成为此后影响深远的大型译丛“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现代系列出版的首部汉译经典。1997

^① 【德】莫尔特曼：《被钉十字架的上帝》，阮炜译，香港：道风书社，1994年。该译本的主要翻译依据是R. A. Wilson和J. Bowden 1974年的英译本：Jürgen Moltmann, *The Crucified God. The Cross of Christ as the Foundation and Criticism of Christian Theology*, trans. R. A. Wilson & J. Bowden, (London: SCM Press, 1974)。

^② 当时参与该书少量章节翻译工作的还有蒋庆和刘小枫两位学者。

年,上海三联书店引进版权,在这个繁体中文版的基础之上,印行了简体中文版^①。《被钉十字架的上帝》于是成为汉语学界最早接触到的莫尔特曼代表作。自1994年以来,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陆续翻译并出版了莫尔特曼的多部作品,其中最为重要的九卷本《莫尔特曼著作集》的翻译工作已经完成。以《被钉十字架的上帝》问世五十周年为契机,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正着手编纂从德文原文移译的《被钉十字架的上帝》繁体中文学术版^②,以为汉语学界提供一个与时俱进的译本基础。为纪念《被钉十字架的上帝》问世五十周年,本辑编者特别邀请五位资深学人撰文,从不同角度推进汉语学界对这部二十世纪伟大经典的认识和理解。在介绍这五篇论文之前,编者将对《被钉十字架的上帝》的理论肌理与历史语境进行简短梳理。

1972年,慕尼黑凯撒出版社印行首版《被钉十字架的上帝》^③。据莫尔特曼在自传《宽阔之地:一个生命的历史》^④中回忆,他在1969年的讲座“耶稣十字架中的上帝”^⑤中已经概括陈述出此书的基本思想,经过约两年的扩充修订,正式出版的《被钉十字架的上帝》引发强烈反响,程度绝不亚于《希望神学》。莫尔特曼一生笔耕不辍,著述等身,然而没有任何其他作品能像《希望神学》和《被钉十字架的上帝》那样,引发如此之多的学术讨论,以至于这些讨论分别被汇编为两部论文集^⑥!莫尔特曼多次提及,《被钉十字架的上帝》虽然比《希望神学》晚出八年,但对它的酝酿思考却远远在先,因为早在战后初期步入校园,受教于哥廷根大学的

①【德】莫尔特曼:《被钉十字架的上帝》,阮炜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

②新译本的翻译工作目前已经完成。

③ Jürgen Moltmann, *Der gekreuzigte Gott. Das Kreuz Christi als Grund und Kritik christlicher Theologie* (München: Chr. Kaiser Verlag), 1972.

④ Jürgen Moltmann, *Weiter Raum. Eine Lebensgeschichte*, 185.

⑤ Jürgen Moltmann, „Gott im Kreuz Jesu,“ in *Umkehr zur Zukunft* (München: Siebenstern, 1970), 133-147.

⑥ Wolf-Dieter Marsch, hrsg., *Diskussion über die «Theologie der Hoffnung»* (München: Chr. Kaiser Verlag, 1967); Michael Welker, hrsg., *Diskussion über Jürgen Moltmanns Buch «Der gekreuzigte Gott»* (München: Chr. Kaiser Verlag, 1979).

伊万德（Hans Joachim Iwand, 1899-1960）之时，莫尔特曼就在这位钟情于青年路德称义论的大师的启发和鼓励下，萌生构建属于自己时代的十字架神学^①的意念。

在莫尔特曼求学之时，最具原创性的十字架神学方案已诞生于东亚。日本京都学派思想家北森嘉藏（Kazoh Kitamori, 1916-1998）1946年出版了《上帝之痛的神学》^②，将痛苦视为上帝最内在的本质，强调三一一位格中的父要以子的死为代价，以克服他对人的怒，父让子死才是三一之中第一位格与第二位格关系的核心，古典三一论所强调的父生子只是对此的预备。借助这个思想方案，北森为路德在《海德堡论纲》（1518）中提出的十字架神学（*theologia crucis*）开辟出了一条全新的诠释路径：十字架涉及的不只是受难，更是三一之间的关系建构。二十六年之后，《被钉十字架的上帝》踏足的正是同一条路径，由于具备《希望神学》奠定的终末论基础，这条前辈开拓的思想方向最终被莫尔特曼扩展推进至一个更加深广的境界^③。如果说北森的三一思维重在第一位格主动“大义灭亲”，莫尔特曼的三一思维则突出第二位格被动遭受遗弃，思考起点并非父自己的行动，而是子以被弃于十字架为顶点的历史性差遣^④。父的痛不是因为必须克服爱与怒之间的冲突，而是源于主动认同于子遭受的被遗弃，这里的上帝形象不再是以勇武隐忍的理想武士^⑤为模板的“强”上帝，而是朋霍费尔意义上苦弱无力的“弱”

^① Jürgen Moltmann, *Weiter Raum. Eine Lebensgeschichte*, 50-51.

^② 【日】北森嘉藏：《上帝之痛的神学》，洪亮编，汤恺杰译，宋军校，香港：道风书社，2021年。

^③ 关于北森和莫尔特曼之间的差异，可参考编者为《上帝之痛的神学》撰写的中译本导言。

^④ 以子的历史性差遣为起点构建三一论，这是莫尔特曼和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的一致之处，也是他们和巴特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发展出的三一论方案之间的根本区别所在，后者的出发点是父的自我启示。

^⑤ 与这个“强”上帝形象相应，北森在《上帝之痛的神学》中没有反思过武士道的虚伪性以及日本军国主义给其他东亚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在历史观这个问题上，莫尔特曼与他有根本差异，针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可参考编者拙文：《莫尔特曼与北森嘉藏论上帝之痛》，《汉语基督教学术论评》，2019年第28辑，第143-172页。

上帝^①，二十世纪的上帝论由此掀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崭新一页。

就思想源流而言，莫尔特曼偏重黑格尔左派，他和前辈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一样，看重费尔巴哈对“基督教的本质”所做的批判性解构，尤其是他揭示的上帝论与人论之间的对应关联。《海德堡论纲》是否也蕴含某种特定的人论？正是藉此发问，莫尔特曼与北森分道扬镳，创造性地把路德对经院哲学认识论的否定转化为一种关于真实人性的批判理论：衡量何为真实人性的标准并非人类投射的理想自我，而是被钉者的人性（*humanitas*）、虚弱（*infirmitas*）^②和愚拙（*stulticia*）^③。相应于具有悲情（*Pathos*）的受难上帝，人应成为共悲情的人（*homo sympatheticus*），如果说前者的悲情体现了神性本质的丰足与自由，那么后者的共悲情则揭示出真实人性内在的交互性趋向和以此为前提构建群体自由^④的潜能。在1984-1985年度的吉福德讲座（*Gifford Lectures*）^⑤《创造中的上帝》里，莫尔特曼更将这一思想线索延伸至对健康与疾病之关系的论述中，指出健康生命的人性活力恰恰体现为对痛苦、疾病、残障与死亡的接纳，并以此自我肯定。否定人类以痛苦和死亡为主要标志的有限性，这是当前追求人类体能、认知、情绪等增强以至数字永生（*Digital Immortality*）的超人类主义在人性观上的基本倾向，对于如何判断并评价这一倾向及其社会伦理后果，莫尔特曼基于《海德堡论纲》的批判性人论足以提供强劲的思想助力。

^① 莫尔特曼对上帝论的这一更新启发了一大批后现代激进思想家，例如【美】卡普托（*John D. Caputo*）：《上帝的苦弱》，芮欣译，台湾：橄欖出版社，2017年。

^② *infirmitas*直译的意思是丑陋。

^③ 对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可参编者拙文：《海德堡论纲的十字架神学及其当代解读类型》，《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2021年第54期，第239-267页。

^④ 这一思想成为其日后著名的“社会三一论”的源头之一，参【德】莫尔特曼：《三一论与上帝国：论上帝的教义》，周伟驰译，香港：道风书社，2007年。

^⑤ 吉福德讲座由吉福德（*Adam Lord Gifford, 1820-1887*）发起，1888年举办首场，至今仍由爱丁堡、格拉斯哥、安圣德鲁斯和阿伯丁四所大学合办，最初旨在推进“自然神学”的研究，然而经过之后百余年的发展，吉福德讲座逐渐演变为人文社科研究领域仅次于诺贝尔奖的学术表彰机制，历史中受邀者的主讲者包括怀特海、阿伦特、乔姆斯基、查尔斯泰勒等一大批重要思想家。

从历史语境来看,《被钉十字架的上帝》承载了现代德国以二战罪责经验为核心的文化记忆,这是一个带着“罪责负担”^①的奥斯威辛同代人对苦难奥秘的追究,其思想关怀并非冷静抽离的神义论思辨,而是要战栗探问“奥斯威辛中的上帝或被钉者上帝中的奥斯威辛”^②。这种生存论意义上的紧迫感和切身性为《被钉十字架的上帝》以及《上帝之痛的神学》所共有,也是它们作为一流经典的基本标志。如何把情的因素注入十字架神学,而不是停留于黑格尔意义上“思辨的受难周五”^③?北森的选择是借用日本古典歌舞伎曲目中以例如《寺子屋》和《熊谷阵屋》为代表的“悲剧”^④传统,莫尔特曼则是回归旧约诗篇中个体性哀告诗(Klagelied)充满辩证特征的敬虔结构:以对上帝的不在场(“掩面”)的强烈控诉反向表达^⑤与他联系的强度。读者之所以能对《被钉十字架的上帝》的著名天问“我的上帝,你为何离弃我?”心有戚戚,这要归功于诗篇所奠定的共鸣基础。《被钉十字架的上帝》对个体性哀告诗传统^⑥的开掘和运用,丰富了《希望神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出埃及传统,也使得在两部著作中都发挥核心理论功能的保罗书信传统被衬托出更加丰富而深刻的精神面向。以诗寓情,以经辨理,《被钉十字架的上帝》兼顾学科专业性与时代重负的思想整合力足以垂范后世,启迪后人。

^① Jürgen Moltmann, *Weiter Raum. Eine Lebensgeschichte*, 186.

^② Jürgen Moltmann, *Der gekreuzigte Gott. Das Kreuz Christi als Grund und Kritik christlicher Theologie*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 1996), 267.

^③ 早在《希望神学》关于“上帝之死”的一个超长脚注里,莫尔特曼已初步探讨了这个问题。参见Jürgen Moltmann, *Theologie der Hoffnung. Untersuchungen zur Begründung und zu den Konsequenzen einer christlichen Eschatologie*, 152-155.

^④ 【日】北森嘉藏:《上帝之痛的神学》,166-167。北森对歌舞伎“悲剧”的诠释完全被限制在日本传统社会的家庭血缘关系(尤以父子关系为核心)之中,无法突破并触及到因日本侵略而遭受苦难的其他东亚人民的真实“悲剧”,这是《上帝之痛的神学》的一个结构性局限。

^⑤ 相关分析参编者拙文:《与莫特曼一起研究巴特》,载《巴特与莫特曼管窥》,香港:德慧文化,2021年,第157-161页。

^⑥ Bernd Janowski, *Konfliktgespräche mit Gott. Eine Anthropologie der Psalmen* (Neukirchen-Vluyn: Neukirchener Verlag, 2009), 347-355.

本辑诠释《被钉十字架的上帝》的五篇论文分为两组，第一组包含三篇论文，属文本研究范畴，三位作者分别从三一论、莫尔特曼对朋霍费尔上帝受难观的发展和莫尔特曼的施密特批判三个角度，深入剖析了《被钉十字架的上帝》的主要思想肌理；第二组包含两篇论文，属接受史（Rezeptionsgeschichte）范畴，两位作者分别介绍了自己继承并推进《被钉十字架的上帝》的探索性理论方案。

第一组论文的首篇作者为台湾神学研究学院教授林鸿信，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他负笈德国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莫尔特曼。在《《被钉十字架的上帝》对三一论的贡献》一文中，林鸿信细致分析了《被钉十字架的上帝》对内在三一与经世三一之关联的全新解读，尤其是莫尔特曼如何借助三一一位格间的交互关系来诠释十字架和上帝受难，从而对二十世纪的三一论复兴做出了独特且具突破性的贡献。除此之外，该文从《被钉十字架的上帝》中的三一论入手，梳理了巴特与莫尔特曼在解读十字架受难意涵上的方向性差异，如果说前者的理论框架是神人二性论，后者的思想焦点则是“一个发生在各各他十字架的事件，亦即圣子之爱与圣父之悲以及从其中圣灵开启未来、创造生命的事件”，这一事件贯通内在三一与经世三一，兼具超越性和内在性。在林鸿信看来，《被钉十字架的上帝》意味着莫尔特曼“三一神学的启航”，是其立足于圣经叙事的“三一视角”在上帝论层面的落实，在其之后的思想发展中，这一视角才逐渐扩展至基督论层面以及七十年代初期尚未完善的圣灵论层面。

第二篇论文的作者为香港浸信会神学院基督教思想史（神学与文化）教授邓绍光，他在博士期间师从圣安德鲁斯大学著名莫尔特曼专家包克穆（Richard Bauckham）。他的论文《莫尔特曼《被钉十字架的上帝》对《狱中书简》的引用》深刻剖析了两者在上帝受难问题上的思想勾连。莫尔特曼多次强调朋霍费尔的《狱中书简》以及遗稿《伦理学》对他的影响，在《被钉十字架的上帝》中更是直接引用其著名论断“只有受苦的上帝能够帮助”。以往研究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往往浅尝辄止，未能充分解说莫尔特曼究竟如何继承了朋霍费尔提出的“受苦的上帝”，

如何发展出独立的进深见解。邓绍光在论文中首先强调了两者在响应时代处境和批判传统上帝观上的相似性，继而明确指出，朋霍费尔理解的“受苦的上帝”侧重点在“其存有是为他者的”，《被钉十字架的上帝》继承了“为他者”这个关键性思想线索，但又为其增加了终末论维度，从而区别于朋霍费尔仅从道成肉身论说十字架神学的理论进路，将基督作为“在受苦中的为他”推进至作为“我们在盼望中的为他”。

第三篇论文的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张旭，他在二十世纪德语基督教思想史领域治学多年，曾于2008年赴德国图宾根大学访学，问学于莫尔特曼。他的论文《新旧政治神学：莫尔特曼与施密特》集中论述了莫尔特曼在《被钉十字架的上帝》第八章中展开的施密特（Carl Schmitt）思想解构。张旭指出，德国天主教思想家佩特森（Erik Peterson）1935年从三一论角度对施密特《政治神学》中政治一神论的著名批判构成现代政治神学史的第一波；《被钉十字架的上帝》提出的“新政治神学”属于第二波，它一方面延续了第一波的批判旨趣，另一方面整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犹太群体）的历史经验；第三波以及与之并行的“弥赛亚转向”源于施密特以及犹太思想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思想脉络，但其晚近代表德里达和阿甘本都拒绝了“施密特的‘敌友之分’的政治哲学与‘主权者决断例外状态’的政治神学”，在涉及他者和苦难等问题的思想取向上反而与《被钉十字架的上帝》相契合。他认为，对于当前正在发展中的政治神学第三波而言，《被钉十字架的上帝》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和不竭的对话潜力。

第二组论文的两位作者是莫尔特曼在欧美学界深具影响的两位学生，一位是海德堡大学资深教授，海德堡大学国际跨学科神学研究中心（FIIT）创始主任韦尔克（Michael Welker），曾主讲2019–2020年度吉福德讲座，另一位是耶鲁大学神学院亨利·赖特讲席教授，耶鲁信仰与文化中心创始主任沃弗（Miroslav Volf），即将主讲2024–2025年度吉福德讲座。

韦尔克的论文《莫尔特曼令人印象深刻的十字架神学——以及一个

必要的补充》主要复述了他在其基督论专著《上帝的启示》(2012)^①中对莫尔特曼十字架神学的批判性反思,侧重从三一论角度对之进行深化。该文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简要勾勒《被钉十字架的上帝》如何建构与路德的《海德堡论纲》(1518)以及黑格尔的思辨神学的对话关系,第二、三部分陈述韦尔克的十字架神学方案。莫尔特曼在《被钉十字架的上帝》第四章中指出,被钉绝非孤立事件,被钉者在与犹太、罗马和上帝的三重关系中经历了三重弃绝,这构成“历史的十字架”的核心。韦尔克沿着莫尔特曼的这条思想线索,结合巴特的辩证神学(Dialektische Theologie)、晚近新约历史研究以及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卢曼(Niklas Luhmann)的系统理论,突出针对“复活节前”之耶稣的“圣经见证的多维度性”以及十字架揭示世界陷入罪之系统围剿的“启示之力”,试图发展出一种不同于《被钉十字架的上帝》的理论方案,如果说莫尔特曼强调上帝在三一之中承担世界的苦难,韦尔克则在“复活节前”的语境中放大世界在其自我锁闭中对上帝的拒绝,以及上帝与世界彼此分离的危机。这个新思路深化了莫尔特曼对“历史的十字架”的论述,具有重要理论价值^②,然而《上帝的启示》在相关章节中的研究史综述^③过多,对新方案的论点式勾勒^④过于精简,未能引起学界应有的关注,读者可借本期论文一睹韦尔克方案的轮廓。

在论文《被钉者张开的双臂:论〈排斥与拥抱〉应归功于〈被钉十字架的上帝〉之处》一文中,沃弗论述了其经典之作《排斥与拥抱:一种对身份认同、他者与和解的神学探讨》^⑤(1996)对《被钉十字架的

^① Michael Welker, *Gottes Offenbarung. Christologie* (Neukirchen-Vluyn: Neukirchener Verlag, 2012).

^② 参编者在拙文《海德堡论纲的十字架神学及其当代解读类型》中对Welker方案的分析与评价。

^③ Michael Welker, *Gottes Offenbarung. Christologie*, 135-172.

^④ Ibid., 172-178.

^⑤ Miroslav Volf, *Exclusion & Embrace. A Theological Exploration of Identity, Otherness, and Reconciliation*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2019).此书的繁体中文版为:【美】沃弗:《拥抱神学》,王湘琪译,台湾:校园书房出版社,2007。

上帝》的思想继承。他以十分谦逊的笔调指出,《被钉十字架的上帝》透过三一位格的交互关系来诠释十字架,这个具有开创性的思想框架为《排斥与拥抱》奠定了一流的神学地基,他的推进工作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对莫尔特曼理论焦点的调整:首先,针对变化的时代处境,用“和解”议题取代(而非消解)“解放”议题;其次,《被钉十字架的上帝》对上帝受难的理解主要着眼于他和受害者的休戚与共,较少论及加害者这一面,《排斥与拥抱》则从受害人如何可能像被钉者那样拥抱加害者这一极其艰难的伦理实践问题出发,增强了《被钉十字架的上帝》对加害者的神学论述。在沃弗看来,《被钉十字架的上帝》对三一位格交互性的强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为他思考身份认同这个《排斥与拥抱》的核心主题指明了方向,身份认同不应以僵化的排他为前提,而应充满动态,成为“具有包容性和拥抱性的身份认同”。《排斥与拥抱》把《被钉十字架的上帝》第七、八章阐述的十字架神学伦理带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因而自身也成为一部二十世纪的重要神学经典。

在纪念《被钉十字架的上帝》问世五十周年的专辑论文板块之外,本期还收录了其他八篇论文。其中“法浴水风”栏目里有四篇文章聚焦中国社会科学院叶隽提出的“知识侨易”理论,^①一篇考察了中国本土女修会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的努力。“道无常名”栏目中的三篇文章关乎了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和马丁·路德。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张斐的论文《花之安中国女性书写中的‘知识侨易’》聚焦十九世纪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关于中国女性的著述。花之安的“女性书写”可以视为现代语境中的一种“汉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实践”,另一方面,他的“女性书写”又预设着显而易见的欧洲中心论,从中“生成了一条以女性地位论证中国与西方文明等级差距的殖民主义逻辑链”。西安外国语大学温馨在论文《身份建构·传教实践·知识迁移——郭实猎个体侨易路径与全球性知识侨易》中梳理了德国十九

^①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世纪传教士郭实猎的生平与著述，突出他游走于东西方之间的“新教开拓冒险精神”和他作为“传教士、帝国主义者及文化中介者”的多重历史身份。在作者看来，郭实猎的“个体侨易”在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在知识与文化上的流转移。

上海外国语大学董琳璐在论文《“择”——“译”——“释”——卫礼贤“道”之翻译与知识侨易路径》中考察了德国著名汉学家卫礼贤对《道德经》和《易经》的翻译工作，尤其是他以德文词汇Sinn来翻译并诠释“道”的内在理路。卫礼贤的翻译实践与步骤可以用“择、译、释”三个字来概括，它们分别对应着“选择、转换和消解三种行为”，是知识侨易现象的重要范例。

澳门大学王雨的论文《李提摩太、数字与晚清的知识侨易》介绍了晚清传教士李提摩太针对出版以及知识流通网络的反思。李提摩太在宗教理念上重视知识的时效性，在认识和理解清帝国结构上突出数据和统计学的意义，在作者看来，“正是在知识侨易的过程中，数字上升为李提摩太思考和重构现实世界的重要方式。”

中国人民大学刘贤在《“修文德以来之”——圣女小德兰与中国本土女修会德来小妹妹会》一文中论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效仿小德兰的雷鸣远在河北安国成立的德来小妹妹会，着重考察了其突出克己苦修的会院文化、修道纲领以及努力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的“国风化”特质。

在《奥古斯丁创世思想中的“质料”和“形式”——以柏拉图的“载体”和亚里士多德的“质料”为参考》一文中，宁夏大学马斌和吕耀军结合奥古斯丁的《忏悔录》第12-13卷及其《〈创世纪〉字解》第1卷，展示了这位被视为柏拉图主义者的古代教父在质形论上可能受到的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同时强调了他突破古代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创造论和救赎论特质。

浙江工商大学石敏敏的论文《论奥古斯丁的二次创造观念》论述了奥古斯丁围绕有形宇宙、天使和人的受造而提出的“二次创造论”，作者强调这个理论在创造论和救赎论、终末论之间建立的对应关系，指出

由此产生的与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以及希腊教父在创造观上的根本性理论差异。

中国人民大学周施廷的论文《从公开信到教会条例—马丁路德与宗教改革的信息网格构建及深化践行》从社会史以及信息传播角度考察了路德对1521至1533的宗教改革的深刻影响，试图从他如何运用公开信构建与民众之间的沟通管道、如何影响新教统治者的政策、以及政策如何进一步制度化这三个方面，回答宗教改革何以从最初的教义辩论发展至后来的社会性改革运动。

总体而言，本辑纪念《被钉十字架的上帝》问世五十周年，甄选的五篇力作从文本内涵以及接受史两个维度协作展现了这部经典的理论价值和划时代意义，编者在此向五位资深学人的共同努力表示感谢，也期待这部伟大而深刻的诚意之作在当下的汉语世界激发出更多新的思想探索，丰富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平等、开放的精神交流，而这也正是本辑其他八篇论文的根本立意所在。

特邀执行主编简介:

洪亮，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Introduction to the guest editor

HONG Liang, Professor, School of Philosophy,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mail: liangh@hust.edu.cn